中華譯學館·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许　钧◎总主编

文学翻译策略探索

基于《简·爱》六个汉译本的个案研究

袁　榕◎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華譯學館·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许　钧◎总主编

文学翻译策略探索

基于《简·爱》六个汉译本的个案研究

袁　榕◎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策略探索:基于《简·爱》六个汉译本的个案研究/袁榕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1
(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8-19868-4

Ⅰ.①文… Ⅱ.①袁… Ⅲ.①《简爱》—文学翻译—研究 Ⅳ.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81557 号

中華譯學館

文学翻译策略探索
——基于《简·爱》六个汉译本的个案研究
袁 榕 著

出 品 人 鲁东明
总 编 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张 琛 包灵灵
责任编辑 包灵灵
责任校对 陆雅娟
封面设计 程 晨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9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868-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中华译学馆宗旨

以中华为根 译与学并重
弘扬优秀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
拓展精神疆域 记动思想创新

丁酉年冬月许钧撰 罗衡书



特别感谢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翻译研究中心对出版本专著的资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个时期，中国译界学人对翻译的思考大多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数次翻译高潮的考量与探讨。简言之，主要是对佛学译介、西学东渐与文学译介的主体、活动及结果的探索。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让我们不断拓展视野，对影响译介活动的诸要素及翻译之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考察一国以往翻译之活动，必与该国的文化语境、民族兴亡和社会发展等诸维度相联系。三十多年来，国内译学界对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五四”前后的文学译介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西古今关系发生了变化，其态势从总体上看，可以说与“五四”前后的情形完全相反：中西古今关系之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新世纪的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而古今之变，则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对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精华有了新的认识，完全不同于“五四”前后与“旧世界”和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

与革命。于是,就我们译学界而言,对翻译的思考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对翻译思考的路径和维度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涉及中西,便是由西学东渐转向中国文化"走出去",呈东学西传之趋势。变化之二,涉及古今,便是从与"旧世界"的根本决裂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与发扬。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给译学界提出了新的大问题:翻译在此转变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翻译在此转变中如何定位?翻译研究者应持有怎样的翻译观念?以研究"外译中"翻译历史与活动为基础的中国译学研究是否要与时俱进,把目光投向"中译外"的活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当中国一改"五四"前后的"革命"与"决裂"态势,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在世界各地创建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之时,"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这双重之问也是我们译学界必须思考与回答的。

综观中华文化发展史,翻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形式与内涵在不断丰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被动的联系,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翻译活

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基于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思考，浙江大学于2018年正式设立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旨在“传承文化之脉，发挥翻译之用，促进中外交流，拓展思想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中华译学馆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译的层面，推出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译丛，“译入”与“译出”互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的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等，以翻译与文学为核心开展系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我们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集合全国译学界的力量，推出具有学术性与开拓性的“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积累与创新是学问之道，也将是本文库坚持的发展路径。本文库为开放性文库，不拘形式，以思想性与学术性为其衡量标准。我们对专著和论文(集)的遴选原则主要有四：一是研究的独创性，要有新意和价值，对整体翻译研究或翻译研究的某个领域有深入的思考，有自己的学术洞见；二是研究的系统性，围绕某一研究话题或领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合理的研究方法、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以及较大的后续研究空间；三是研究的社会性，鼓励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选题与研究，如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研究、语言服务行业与译者的职业发展研究、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影响研究、翻译教育改革研究等；四是研

究的(跨)学科性,鼓励深入系统地探索翻译学领域的任一分支领域,如元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等,同时鼓励从跨学科视角探索翻译的规律与奥秘。

青年学者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我们特别欢迎青年翻译学者向本文库积极投稿,我们将及时遴选有价值的著作予以出版,集中展现青年学者的学术面貌。在青年学者和资深学者的共同支持下,我们有信心把"中华翻译研究文库"打造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精品丛书。

许　钧

2018 年春

序

翻译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或翻译学(translatology)在中国则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研究主要是指从某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对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因为文学作品的审美文化含量极高，对译者的要求也最高，其对原作的改写甚至再现空间也最为广阔，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不啻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有鉴于此，文学翻译所引起的批评性讨论甚至争论也最为常见，因为正是这些批评性的讨论甚至争论才使得翻译研究这门学科颇有生气，不断发展完善，并产生出大量的相关专著和论文。袁榕博士的这本专著就是专注翻译策略研究的一部学术著作，基于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几年前，我有幸应袁榕的导师孙致礼教授邀请，主持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就觉得她的博士论文超越了一般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从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入手，聚焦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六个主要译本，通过仔细比照各个译本的成败得失，揭示出隐于其背后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选择，从而提出了一些颇能引起学界讨论的理论洞见。同时我也指出，这篇博

士论文仍有很大的发展和修改空间，因而建议她在答辩后将其修改成专著出版。现在她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新资料文献的搜集和阅读，又对之做了较大的修改。在这部专著即将提交出版前，她希望我为之撰写一篇序，我想这也是我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所义不容辞的义务。

确实，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翻译，通常从两个视角切入：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尤其是一些比较文学学者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将其扩展到文化研究的领域，酿成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文化转向”，对传统的基于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促使翻译研究得以走出语言中心主义的藩篱，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且自满自足的学科。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变革作用的强调从来就没有被学者们忽视。今年适逢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翻译，新文化运动至少不会像当时那样轰轰烈烈地爆发。没有翻译，大量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人文学术著作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并启迪国人的思想和观念。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对翻译的重要性的认识就不能只是基于语言转换的层面，而更应该基于文化阐释、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层面，以及社会变革的层面。这样看来，翻译的策略就成了译者和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选择。

诚然，翻译策略选择问题应该是文学翻译研究的永恒主题，它贯穿于文学翻译研究过程的始终。正如本书作者所认识到的，作为一种策略选择，译者并非随意的选择，在选择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系统的社会文化制约机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约着译者做出翻译决策。但对翻译策略选择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语言层面的比照，而更应具有社会历史的眼光，应将其纳入社会文化研究的宏大视野，同时也应看到译者选择不同的策略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所发挥的功用，这样的研究才不是孤立地看待翻译行为，才能对译著的评价具有客观公正性。显然，这是作者对自己提出的很高的要求。通过仔细阅读这本书稿，我发现她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一要求。

袁榕也和当今的许多翻译研究者一样，在步入这一学术殿堂之前，从事了大量的口译和笔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当她进入翻译研究学科领域后，稍加补充必要的理论知识，就能游刃有余地进入学术研究的层次：对于新入门的译者而言，这些基于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使人感到丝毫不脱离实际；而对翻译学研究者而言，从实践的比较中抽象出的结论又不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文化高度。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文化学派研究翻译，注重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主张将翻译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联系起来，但这一流派并不认为翻译研究应脱离语言研究。相反，他们十分重视对语言的本体研究，重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语言毕竟是翻译操作的主要形式，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与文化交融，这一切最终都是通过对语言的操控而得以实现的。袁榕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这本专著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要方法，以“面向译本”“面向功能”为主要导向，选取《简·爱》在中国跨越近一个世纪里出现的六个有研究价值的汉译本为蓝本，深入分析不同历史

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从意识形态层面、诗学层面、话语世界层面以及语言差异性层面详细论述了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性。尽管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以勒菲弗尔的制约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因素”为理论基础，试图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以便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本着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探讨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以及这样的翻译策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但在实际论述中，作者的倾向性观点也是明显的。

在袁榕看来，翻译策略研究应全面而系统地进行，应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翻译策略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译本研究而抽象地高谈阔论，翻译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综观学术界对《简·爱》翻译策略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简·爱》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丰富的文学艺术价值以及丰厚的文化价值含量，这又增加了《简·爱》翻译的难度，而中国出现《简·爱》复译的热潮又为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这种不脱离翻译实践，又不无理论分析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倡导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

多年前，我在专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研究之前，就近距离地接触了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这两位“文化转向”的始作俑者，发现这两位翻译理论大家在进入理论研究的殿堂前就已经广泛从事了多语种的翻译实践：勒菲弗尔的母语是荷兰语，但他用母语和英、法语著译的水平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而巴

斯奈特这位来自东欧的学者更是娴熟地掌握了东西欧多国的语言，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不像国内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从事翻译的文化视角研究会忽视语言的因素。因此，认为文化翻译研究者脱离翻译实践是毫无根据的，只是文化研究学派更加彰显翻译的文化因素。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承认，袁榕对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

既然翻译涉及至少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其间的差异就应该是主要的，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翻译。诚如作者所言，在文学翻译中，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与追寻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内容。两种语言的差异永恒存在，但两种语言又绝不是相互陌生的，它们对所指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又注定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因此，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可译性。这种可译性的程度多少，是文学翻译家把握的度，也是文学翻译研究永恒的主题。这应该是作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得出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纪念五四运动百年之际，翻译之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作用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我本人也在这方面多有著述。确实，在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概念，同时又是经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阐释和发展的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这同时也预示了其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我们从中不难

看出，翻译的巨大作用远远超出了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更是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向外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使得经过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和阐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国际化。同样，用于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推论：翻译将世界文学引入中国，同时，翻译也已经并仍将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从事这两个方面的翻译，都离不开翻译策略的选择。这样看来，本书兼具了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值得广大读者一读。不知国内同行读者以为然否？

王　宁

2019 年年末于上海

前　言

翻译策略是文学翻译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总体上来看有两种趋势：一种是以原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另一种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取向的翻译策略。虽然从表面上看，选择哪一种策略都是译者的自行主张，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本书以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追溯他的翻译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更深刻地理解勒菲弗尔翻译理论思想中关于权力对翻译的操纵所做的论述。继尼采提出“权力意志”是人存在的本质之后，福柯用权力谱系学的方法分析现代社会新型的权力机制，即作用于“人的身体”的“规训权力”。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种关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形成网络关系。在权力关系中，人逐渐失去自主体验和活动能力，成为可操纵和服从与温顺的主体虚构物。由此福柯得出“人之终结”这一令人文科学界震惊的结论。福柯还进一步认为，社会是一个权力运作的系统，它与社会各个层面特定的“话语”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缜密的网，驾驭其成员的思维、行动和组织规范。他在质疑科学主义“求真意志”的同时，深刻地指出人文科学与权力紧密相连的本质关系。在人文科学中，知识参与了权力运作策略的制定过程，知识是为权力关系制订一系列规则、标准及规范的实际活动过程。福柯认为，“话语”是获取“知识”的途径，而“话语”不仅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与话语实践紧密结合的动态总体。

勒菲弗尔将翻译研究归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看到了目标语社会中“权力”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为翻译的叛逆行为找到了深层次的根源。他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主要的权力操纵因素，赞助人的意志代表着目标语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制约着译者对原语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的处理。当语言的差异性与目标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发生矛盾时，往往是后者胜出。他通过对大量翻译现象的研究，发现语言学派致力追求的等值翻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不可能的，译者的翻译策略都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诗学层面、话语世界层面做出的语言选择。随着他对文学翻译策略选择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完成了对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大因素的研究并做了秩序排列：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和语言。勒菲弗尔一再重申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发生碰撞，译者周旋于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受目标语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是中立的、客观的，总会打上目标语社会中“权力”因素的烙印。

勒菲弗尔指出，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总是在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等四个层面上做出的决策，而其中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最大。因此，翻译策略的研究必须与具体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翻译策略不具备规约性，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时代特征性，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很自然会与一定历史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随历史语境的变迁而有所调整变化。

本书以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要方法，以“面向译本”“面向功能”为主要导向，选取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简 · 爱》在中国跨越近一个世纪里出现的六个有研究价值的汉译本为蓝本，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从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四个层面详细论述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性。

1847 年，英国文学家夏洛蒂 · 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发表其成名之作——*Jane Eyre*(汉译名《简 · 爱》)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随后一百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